经济衰退对农民工的影响

孔 涛　孟 昕　张丹丹

一　导言

最近的全球经济萎缩，已对许多国家的就业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全面影响尚未体现出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计 2010 年的失业率将达到 10% 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经济下降相比较而言还算缓和，预计目前为止，经济至少增长了 6 个百分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的提高，然而，即使这样的高增长也难以抵消大规模失业对国家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

目前中国的就业状况可能是以下三大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政府和中央银行在 2007 年推出的旨在放缓经济增长的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有趣的是，该政策可能对目前的经济危机产生了同样的影响。二是在 2008 年初中国颁布了新的《劳动合同法》。这项法规的出台极大地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的成本，有证据表明，雇主通过减少劳动力投入来应对这一法规。三是 2008 年下半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出口订单大幅减少。这三大事件的相继发生对就业产生的最严重的影响体现在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上，因为这一人群是中国出口业和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劳动力来源。这三大事件在发生时间上的紧密联系使我们很难判断各事件分别产生多大的影响，但这足以证明，从 2008 年中期至 2009 年初中国经济的衰退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总的来说，这三大冲击都对同一人群——农民工——产生了不利影响。2008 年，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约有 1.3 亿，占城市总劳动力的 1/3。他们的工作都与出口工业和建筑业密切相关，而经济衰退对这两个行业的冲击尤为

严重。农民工承担了不相称的经济调整后果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衰退成本的不均衡分担问题，更要重视大量农民工失业所引发的问题。如果经济危机处理不当，农民工大量失业将会直接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在本文中，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我们将给出工作机会下降的程度及其地理分布和产业分布。其次，我们要研究经济衰退对哪一类农民工影响最大。

始于 2007 年下半年的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城乡移民（RUMiCI）项目提供了一组独特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问题。作为这项研究的核心部分，我们对 15 个城市的 5000 户移民进行了调查。在经历了对移民家庭的筛选、采访、跟踪和再次访问之后，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数据，足以对正在发生的情况给出一个详细的记录。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我们将提供关于经济增长期和衰退期的经济政策的背景资料。第三部分会讨论经济衰退对就业的影响程度。第四部分，我们会对 2008 年受经济衰退牵连而导致失业的农民工的类型进行研究。最后一部分会给出结论。

二　背景

2006 年，中国经济增长突破两位数，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也创下了新高。2007 年，重新平衡经济被列入政府议程。而在 2007 年上半年，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是资产价格（股市和楼市价格）的快速上涨。随着 2007 年下半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的反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不得不采取措施来抑制经济过热。在 2007 年，贷款和存款利率曾 6 次上调，而法定存款准备金上调了 10 次，均达到 20 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07 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2008 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两个防止”，即防止经济增长过热和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通货膨胀。

在这种宏观经济背景下，十几年来关于雇佣关系的最重要的改革正在酝酿之中。在 2007 年 6 月举行的第二十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批准通过了新的劳动合同法法案，并定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员工，包括农民工在内，被赋予了集体协商的权利及获得遣散费和最低工资保障等权利。

这部法律自2006年以来先是经历了两极分化的起草过程，接着引发了强烈的争议，最后终于正式通过（Cooney等，2007），这种一波三折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该法律的重大意义。一方面，数量不断增加的劳资纠纷和其他一些社会问题破坏了社会的稳定，一个全国性的劳动法案亟待实施。而且，中国政府已开始实行一项推动产业升级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战略。中央政府的长期发展议程，依次为积极推动创新服务行业，不断提升企业价值规模，同时要与地方上的污染行为作斗争。支持立法的人们认为，中国迫切需要一套旨在推动员工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尤其是那些能够提供更大的就业保障和收入保障的法律，这些法律将与中国的发展议程相一致。另一方面，这部法律的实施必然会增加劳动力成本，这就限制了企业调整员工的灵活性，并且可能会造成“对雇佣关系的过度调节”（Zhao和Lim，2008）。

新的劳动法在正式颁布之前，就已在雇主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当时这部法律仍在起草进程中，但一些工厂已经为逃避新法律带来的责任和潜在的额外费用做准备。Wang等人（2009年）概括了雇主们通常使用的两个应对策略。首先是“创造性遵守”（也就是逃避责任）。一些雇主强迫员工先主动辞职，然后再重新雇用他们，这样一来，那些工龄较长的老员工就丧失了本应该享有的权利。例如，据称中国最大的电信网络设备制造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曾在2007年底，鼓励7000多名员工参加“主动辞职”计划，而公司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不愿意依照法律给工龄超过10年的老员工一个永久职位（“中华全国总工会称：在与工会商谈之后，华为同意暂停引起争议的雇佣计划”，人民日报在线，2007年，<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76/90882/6300313.html>）。

其次是裁员策略，这更关系到农民工的切身利益。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制造商开始关闭他们的工厂，甚至将生产转移到中国或东南亚一些工资更低的地区。根据Wang等人引用的一种说法（2009），在2008年初，广东省已经有1000家鞋类及配件生产商或降低了产量，或关闭了工厂。一些生产商转移到了中国内地，而另外一些则迁往越南和缅甸，因为那里有廉价的劳动力，且劳动法规相对而言不是很健全。同样，在新的劳动法生效后，为了规避法规监管，已经受出口需求减少影响的生产商们纷纷将工人辞退，再重新签订工作合同（“最后呼吁广东鞋类生产商”，亚洲时报在线，2008，<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_Business/JB05Cb01.html>）。

2008 年初，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 13%，实现贸易顺差 293 亿美元，外汇储备额达到近 2 万亿美元。当时，中国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也在不断上升，而这种上行走势自 2002 年以来就未曾中止过。而在 2008 年 2 月，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猛增，按年计算增幅达 8.7%（国家统计局，2009）——达到 12 年来的最高水平。特别是在 2008 年初，猪肉和食用油价格暴涨，致使 2008 年的总体粮食价格上涨了 14.3%。为应对这种状况，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信贷增长，稳定通货膨胀预期。这是 10 年来中国第一次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除了上调存款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政府还加大银行贷款的难度，以此来控制信贷增长。银行改变了以前直接批准的做法，而是严格限制申请人按揭贷款购买“第二套房”。这样做是为了控制投机购房者故意抬高楼价，导致房地产价格虚高现象的发生（Batson，2008）。商业银行也出台相关规定控制贷款限额。与此同时，为了平衡中国的贸易顺差，出口退税率有所降低，且人民币有所升值。

当政府还在担心经济会过热时，沿海出口商和纺织品制造商已经受到了成本上涨和出口需求削减的冲击。与此同时，一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疲软。显然外部冲击已经对就业产生影响。仅仅是 2008 年上半年，成本的上涨和出口需求的削减就已经导致最少有 6.7 万家中国工厂倒闭，无形中加剧了就业市场的竞争，使得一部分农民工失业返乡（Wong，2008；“中国 2008：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数字时报，2008，<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08/12/2008-fi nancial-crisis-and-china/>）。很明显，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已不再是经济过热，而政策制定者们也逐渐调低了通货膨胀的威胁预期。现在关于去耦合的讨论已变得无关紧要，在这种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中国很快意识到必须重新把工作重点放在促进经济稳步增长方面。因此，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的“一个确保和一个控制”政策取代了“两个防止”政策。政策制定者们终止了对人民币的升值，并且上调了出口退税，以此来帮助出口商。2008 年 9 月中旬，中国人民银行 6 年来首次将利率下调，暗示中国正承受着经济衰退造成的影响。

毫无疑问，自 2008 年最后一个季度开始，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据记载，2008 年最后一个季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仅仅增长了 6.8%，低得令人难以置信。2008 年 11 月，中国的出口额 7 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2%，有超过 60 万家中小型企业关闭，数以百万的农民

工失业（Ramzy，2009）。

中国政府4万亿元人民币（58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于2008年11月拉开帷幕，希望借此重启经济。在同一个月，央行将利率下调1.08个百分点，同时降低了银行准备金要求。此外，政府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希望通过增加投资和消费来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这些政策包括：减少购买机械设备的增值税（VAT），增加出口退税，商业银行减少申请按揭贷款的限制，并且取消了贷款限额控制。在信贷扩张措施的有力支持下，2009年第一季度以人民币计价的贷款额猛增。然而，把投资转化为产出是需要时间的。2009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减缓到6.1%。2009年1月，出口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7.5%，是继1998年10月以来出口额最少的一个月。出口需求的削减预示着数以百万的农民工将面临失业的威胁。

在衡量经济衰退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些外部因素（如自从2008年底以来出口需求的急剧下滑）和国内政策的力度，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在过去的两年里，从控制经济过热到注入4万亿元人民币来重启经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像坐过山车。此外，新《劳动合同法》极大地改变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与随后外部冲击的影响无关。在考虑几大主要事件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组假设，把各事件产生的影响区分开来：

- 地区差异——新《劳动合同法》在全国范围内都适用，但是出口需求锐减对沿海地区的冲击要大于内陆地区；
- 时间差异——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所产生的效应是2007～2008年年中显现出来的，然后在2008年年中以后又复合了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
- 部门差异——全球经济下滑主要影响建筑业和制造业。

三　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的规模

现有的评估

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新的《劳动合同法》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到底有多严重呢？根据近日经过调查得出的3份评估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在2009年1月，中国农业部对15个农民工输出的主要省份的150个县进行了调查。根据这项调查结果，在1.3亿农民工里约有

15.3%（即2000万）农民工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失去了工作。[①]

在2008年底到2009年初这一段时间，中国国家统计局对来自31个省份里的857个县和7100个乡村的68000个农村家庭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约有1.4亿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截至2008年底，50%的农民工返乡，而这些人中有80%在过了农历新年后又返回城市，剩下20%的返乡农民工决定留在家乡。由此可见，大约有10%的农民工被迫返乡。

在2008年11月到2009年1月这段时间，西路农民工调查组进行了一系列小规模的调查。在接受调查的809人中，在2008年1月14日（即农历新年前12天）之前返乡过节的农民工占89.5%，这其中大约46%的农民工称这次返乡时间比往年都有所提前，而在这46%的农民工中约有76%声称，是因为工厂歇业、裁员或是雇主强迫延长假期才被迫提前返乡的。因此，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约有35%是受经济衰退的牵连而被迫提前返乡。而这其中约有89.5%的农民工是在农历新年之前返乡的，35%的农民工声称过完新年肯定会重返城市，7.2%的农民工认为他们不会再重返城市，但依然有24%的农民工不确定今后是否会重返城市。

这三项研究显示的经济衰退造成的不利影响基本相同。由于这些调查主要是针对农民工输出省份以及农民工重返城市的意愿进行的，所以，在现有的文献里也没有记载这些农民工是否会重返城市，他们重返城市后能否找到工作。在这部分，我们将对参加RUMiCI项目的移民家庭进行筛选、采访、跟踪和重新访问，通过由此获得的客观资料，来了解经济衰退对农民工就业产生不利影响的程度。

RUMiCI调查和跟踪方法

这个RUMiCI研究项目最初是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启动的。该项目调查三类家庭：2008年在指定的15个城市[②]工作的5007名农民工；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5000户城市家庭；来自10个省份或大都会地区（包含指定的15个城市）的8000户农村家庭。[③] 在调查城市和农

① 该数据由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于2009年2月2日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布。

② 这15个城市为上海，广州，深圳，东莞，南京，无锡，杭州，宁波，武汉，重庆，成都，合肥，蚌埠，洛阳，郑州。

③ RUMiCI项目由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AusAID）及福特基金会资助。

村住户时使用的是国家统计局现有的住户调查样本，没有现成的针对农民工的抽样结构。之前对农民工进行调查时采用的是常规的家庭抽样方法，即调查人员在选定的城市街道社区随机选择农民工。关于这种抽样方法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中国的城市里只有一小部分农民工住在城市居民住的社区内，大部分农民工是住在工厂的宿舍、旅馆或他们施工场所的附近，甚至是城市周围的农村郊区。从城市住宅小区中得到的样本或许不能代表农民工人口。为解决这一问题，RUMiCI 研究小组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新型取样策略。

事实上，这项调查采用的抽样方法是，在农民工的工作场所收集信息。更具体地说，我们是将抽样城市划分为 25 万平方米的方形区域，然后随机选择大约相当于每个城市的抽样区域 12% 的方形区域。在被抽样区域里的所有农民工工作场所对农民工进行普查，要调查的内容包括：行业类型，工人总数和其中的农民工总人数。随后的抽样结构会用到这项普查所得的数据，我们也会用这个简单的随机抽样方法来选择将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一旦我们确定了对象，随即会对他/她的家庭展开访问。①

在 2007 年的 10 月至 12 月这一期间，项目小组一直在对 15 个城市的选定区域进行普查。而采样和调查工作是在 2008 年 3 月至 6 月，即农民工结束了新年探亲返城后进行的。我们共采访了 15 个城市里的 5007 户农民工家庭。在 2008 年 3 月至 4 月进行的抽样阶段，我们发现，许多工厂仍处于关门状态，尤其是在东莞、深圳和广州，这种情况更多。该调查公司向我们解释说，这是实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新《劳动合同法》导致的结果。

我们为这个长达 5 年的调查项目制订了专门的跟踪策略。农民工群体最大的特点是流动性较高，这使得跟踪调查相当困难。在调查时，我们详细记录了每位受访者在工作城市和家乡的联系地址，并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此外，为了防止受访者因为搬迁而与我们失去联系，我们还记录了每位受访者的 3 名亲属或朋友的电话号码。这些都是所有跟踪调查通用的跟踪策略。但是考虑到我们调查的对象具有很高的流动性，我们认为有必要强化这些简单的跟踪策略。因此，我们制订了进一步的跟踪奖励办法。首先，每年我们都会为受访者举办三次抽奖活动。第一年的奖金范围是 50 到 2000 元人民币，以后会逐年增加奖金。首次参加抽奖活动的受访者的中奖率是 1.5%，

① 关于采样方法论的详细资料见 http：//rumici. anu. edu. au/。

但如果一位受访者配合完成5年的跟踪调查，那么他获得奖金的可能性将高达20%。不过要注意的是，只有我们跟踪调查成功的受访者，才有资格参加抽奖活动。我们希望这个奖励办法可以激励受访者与我们保持联系。其次，每年春节前我们会按照受访者家乡的住址送去一份礼物，希望借此加强受访者和项目团队之间的联系。

在距离第一次调查结束5个月之后（2008年10月），我们联系了所有的受访者，确认了他们目前的联络方式，以便日后能将礼品准确无误地寄给他们。与此同时，我们公布了首次抽奖活动的中奖名单。之后不久，在2008年12月和2009年2月，我们又进行了两次跟踪调查。[①] 虽然我们已竭尽全力，但是受经济衰退的影响，2008年跟踪调查的受访者流失率非常高。为了弥补部分受访者流失对研究工作造成的影响，在着手进行2009年的调查之前，我们在2007年的普查数据基础之上，又重新进行了取样调查。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2007年获得的普查数据，在经历了经济衰退之后是否还有效。为了了解在2007年抽样调查中的农民工所在的工厂是否改变了经营状态，我们重新对2007年采访过的489个调查区块里的13%的区块（即64个调查区块）进行了采访。这次小规模的重新普查提供了另外一组数据，以便我们了解原来的工厂是否已关闭，还是改成了新的工厂，或是没有改变。但这组数据并不能反映工厂的缩减程度。因此，关于经济衰退造成的影响，这些数据也只是提供了小范围的估计。

使用RUMiCI数据来估计经济衰退对就业产生的不利影响

我们在2007年获得的普查数据，记录了工厂的数量以及城市和各个行业里的农民工人数（表1）。在我们抽样调查的农民工里，67%受雇于服务业和批发零售贸易业，而18%受雇于制造业。众所周知，制造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此外，超过70%的农民工集中在8个沿海城市工作（广州，东莞，深圳，上海，南京，无锡，杭州，宁波）。这些数据反映了经济出现衰退之前，在我们抽样调查的城市里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我们可以拿这些数据与经济出现衰退之后的农民工就业状况作比较。

---

① 2009年的中国春节是1月26日。通常，农民工要返乡过春节，15～20天之后再回到城市工作。因此我们最后一次跟踪调查在2009年2月15日之后进行，此时大部分农民工已返回城市。

表 1　各城市和各行业中农民工及其所在工厂的分布（2007 年普查数据）

	建筑业	制造业	教育和政府组织	各种类型的机构	服务业	批发零售业	总　计
工厂数目(个)							
广　州	550	2201	2699	4952	54732	48863	113996
东　莞	1344	6049	1253	2108	42345	50777	103876
深　圳	1311	2639	1090	2970	43150	37683	88843
郑　州	1628	4379	767	1404	44072	35220	87471
洛　阳	192	947	414	207	10049	6956	18766
合　肥	1130	706	477	1377	30406	27298	61394
蚌　埠	42	260	54	91	3412	3551	7411
重　庆	1280	1668	756	1513	54768	35219	95205
上　海	2091	3772	1804	9553	105370	87002	209592
南　京	916	1374	1168	3595	55938	35880	98871
无　锡	914	5044	914	2133	27689	19633	56326
杭　州	404	1374	1159	2210	36392	31421	72960
宁　波	274	535	162	635	11591	9163	22360
武　汉	1205	4367	1857	2460	62223	53036	125149
成　都	1121	1033	1475	6461	94695	81656	186440
总　计	14404	36348	16049	41667	676833	563359	1348661
各行业和城市的就业率(%)							
	建筑业	制造业	教育和政府组织	各种类型的机构	服务业	批发零售业	总的就业数(人)
广　州	1.30	23.23	2.88	6.07	40.09	26.43	1041502
东　莞	1.24	26.29	3.23	1.72	12.55	54.97	2274729
深　圳	7.21	21.81	0.99	2.77	36.32	30.91	949059
郑　州	21.48	8.21	1.27	1.60	34.49	32.96	434452
洛　阳	8.33	12.92	2.23	0.52	38.85	37.15	95874
合　肥	10.10	5.35	1.29	8.94	36.33	37.99	293956
蚌　埠	7.91	13.78	0.30	1.44	30.32	46.24	24859
重　庆	9.22	4.68	1.24	0.82	48.76	35.28	642618
上　海	8.35	10.85	1.50	11.88	41.29	26.13	1479731
南　京	16.86	15.86	1.19	10.21	38.16	17.73	672406
无　锡	9.40	40.82	2.00	6.03	22.01	19.75	1024504
杭　州	7.06	17.64	2.48	2.69	36.98	33.15	548258
宁　波	26.06	8.99	5.07	10.14	28.21	21.55	216356
武　汉	5.17	28.90	3.08	2.88	36.49	23.47	911481
成　都	10.69	3.08	0.57	6.37	45.83	33.45	877242
总的就业份额	8.36	18.25	2.04	4.68	34.00	32.68	
总就业数(人)	991995	2475530	266698	667909	4282078	2802816	11487028

衡量经济出现衰退之后就业状况的两个数据来源：对部分区域重新普查所得数据和抽样跟踪调查所得数据。

我们将重新普查区域的工厂分为已倒闭的和未倒闭的两种类型。然后使用重新普查所得的数据结合 2007 年普查所得数据，就得出了 2007 年普查区域的各行业中倒闭工厂所占的比例，我们还利用逆概率得出了在整个城市中隐含的倒闭工厂所占的比例。此外，根据 2007 年普查数据反映的农民工人数，我们可以推算出这些工厂倒闭对农民工就业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汇总了经济出现衰退后在城市和各个行业里倒闭工厂的比例表（表 2）。在所有进行抽样调查的 15 个城市里，约占总数 9% 的工厂在 2007 年 11 月至 12 月这段时间倒闭了。在这些城市里，武汉和东莞倒闭工厂的比例最高，而且这两个城市的几乎所有行业都受到了不利影响。总体来看，在这 15 个城市里，建筑业、制造业和各类经销商的倒闭情况最为严重。

表 2　倒闭的工厂分布及倒闭率（2009 年重新普查数据）

表 A：倒闭的工厂数目（按行业—城市权重进行加权处理　单位：个）

城　市	建筑业	制造业	教育和政府组织	各种类型的机构	服务业	批发零售业	倒闭工厂总数目
广　州	0	0	257	990	5711	6261	13220
东　莞	672	3074	501	527	11934	15118	31826
深　圳	82	0	0	858	2123	1489	4553
郑　州	814	0	0	0	5650	4892	11356
洛　阳	96	0	0	0	412	598	1106
合　肥	0	0	238	172	3062	3140	6613
蚌　埠	0	0	0	272		991	1263
重　庆	0	0	0	0	5353	3953	9307
上　海	0	0	361	546	6144	10741	17792
南　京	0	153	156	1514	6978	11012	19811
无　锡	166	1244	0	711	4214	4945	11279
杭　州	101	89	145	0	6000	5308	11643
宁　波	91	76	0	41	874	1857	2940
武　汉	0	662	929	1757	25075	31389	59811
成　都	140	0	0	0	455	1884	2480
总　计	2163	5297	2586	7388	83985	103578	204999

续表 2

表 B:倒闭率(%)

城　市	建筑业	制造业	教育和政府组织	各种类型的机构	服务业	批发零售业	倒闭工厂总数目
广　州	0.00	0.00	6.25	12.20	8.07	7.31	7.69
东　莞	36.36	44.93	21.05	23.08	22.14	24.44	24.65
深　圳	6.06	0.00	0.00	17.81	4.27	3.25	4.27
郑　州	46.15	0.00	0.00	0.00	10.14	10.47	10.30
洛　阳	50.00	0.00	0.00	0.00	1.69	4.00	2.63
合　肥	0.00	0.00	14.29	6.67	6.01	8.02	6.85
蚌　埠	0.00	0.00	0.00	37.50	0.00	9.76	5.17
重　庆	0.00	0.00	0.00	0.00	6.74	7.01	6.67
上　海	0.00	0.00	6.25	3.51	3.77	6.58	4.94
南　京	0.00	7.69	6.67	25.81	8.89	11.76	10.80
无　锡	18.18	21.95	0.00	17.65	11.07	15.81	13.91
杭　州	20.00	5.13	5.56	0.00	12.71	12.97	12.11
宁　波	25.00	6.45	0.00	2.90	5.19	9.09	7.21
武　汉	0.00	15.15	37.50	62.50	34.62	49.15	40.64
成　都	20.00	0.00	0.00	0.00	0.63	2.52	1.57
总　计	12.88	11.89	9.14	11.96	9.48	12.20	9.16

我们把倒闭的工厂数和这些工厂在 2007 年 11 月至 12 月雇用的农民工人数结合起来，就能知道工厂倒闭对就业的影响程度了。我们给出了两种计算工厂倒闭对农民工就业影响程度的产业分布和城市分布（表 3）。平均而言，在进行调查的 15 个城市里，约 13%（即 140 万）的农民工的就业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在这些城市里，东莞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约 34% 的农民工受到牵连。此外，无锡和宁波也受到很大的冲击，约有 20% 的农民工受到影响。假设全球金融危机主要影响的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城市，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 15 个城市的出口量，将它们由大到小逐一进行排列。附录 2 反映了 2006 年这 15 个城市的出口价值与城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以及这些城市的出口排名情况。很明显，在这些城市中，深圳和上海的出口量排名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三。但奇怪的是，这两个城市农民工的就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最小。这一情况也提醒我们，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了目前的经济衰退，而并非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责任。

表 3　农民工的就业受到工厂倒闭的不利影响的比例

单位：%

城　市	建筑业	制造业	教育和政府组织	各种类型的机构	服务业	批发零售业	受影响的农民工的总比例	关闭工厂中的农民工的总数目(人)
广　州	0.00	0.00	0.43	28.51	5.18	8.25	5.68	60400
东　莞	6.17	70.88	0.00	22.96	14.05	22.38	33.69	766808
深　圳	0.42	0.00	0.00	15.05	2.77	14.25	4.56	41911
郑　州	2.10	0.00	0.00	0.00	3.59	8.23	3.61	15886
洛　阳	77.95	0.00	0.00	0.00	0.82	1.85	12.31	8727
合　肥	0.00	0.00	66.67	0.00	3.32	7.52	4.19	12348
蚌　埠	0.00	0.00	0.00	0.00	0.00	8.78	2.57	523
重　庆	0.00	0.00	0.00	0.00	1.73	0.78	1.30	7151
上　海	0.00	0.00	13.89	18.23	2.52	2.46	4.17	78485
南　京	0.00	0.00	7.61	66.53	3.94	11.81	10.28	65426
无　锡	26.89	29.04	0.00	13.95	3.42	24.02	19.98	188434
杭　州	0.00	3.41	1.05	0.00	8.75	1.90	4.43	20552
宁　波	70.42	0.00	0.00	0.12	3.63	10.75	22.33	48539
武　汉	0.00	2.16	1.96	95.51	1.51	27.68	9.43	77173
成　都	0.00	0.00	0.00	0.00	0.00	1.30	0.25	1083
总　计	7.87	23.54	2.25	23.78	3.96	15.05	12.64	1393447
受影响的农民工总数目(人)	81969	573735	5276	164157	152633	415677	1393447	
农民工原始总数目(人)	1674	6252	26	2010	1547	5436	16945	

此外，如果我们研究各行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分布图，就会发现，无论是商品贸易行业（制造业），还是非商品贸易行业（如批发零售贸易业），都受到了影响。例如，在武汉的批发零售贸易市场，有 28% 的农民工的就业受到了影响。就此看来，国内政策和全球金融危机似乎对农民工的就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工厂倒闭效应只是估算经济衰退对就业造成的总体不良影响的下限。凭借重新普查获得的数据，我们无法获知现有工厂的裁员情况。但是，根据我们在 2008 年对 5007 户农民工家庭进行跟踪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现有工厂的裁员情况。即便如此，由于在一般情况下，被跟踪的受访者都存在一定的流失率，因此仅凭跟踪数据来推断经济衰退对农民工就业造成的影响是不准确的。虽然文献资料就一般经济环境

下一般人口的流失速率问题给出一个衡量标准，但是，澳大利亚家庭收入和劳工动态（HILDA）研究组和英国家庭调查所（BHPS）可以提供类似的衡量标准。从第一轮调查结束到第二轮调查开始之前，HILDA 研究组调查的受访者约流失了 13.2%，而 BHPS 约流失了 12.4%（Watson 和 Wooden，2004）。就此看来，我们可以把 HILDA 和 BHPS 的 12% ~13% 的受访者流失率作为一般经济环境下平均的人口流失率的基准点。

但是，我们抽样调查的人群是具有更高流动性的人群。因此，HILDA 研究组和 BHPS 所提供的代表平均人口流失率的基准可能并不适合做我们的目标人群流失率的基准点。在工业化国家，年轻人群体被认为具有很高的流动性——尤其是青年男子（Olsen，2005）。HILDA 研究组在第一轮调查结束到第二轮调查开始之前，仅 20 岁到 24 岁之间的青年受访者就流失了 23.4%（Watson 和 Wooden，2004）。

虽然我们抽样调查的农民工的平均年龄都在 28 岁以上，但他们实际上面对的体制环境与工业化国家中的年轻人所面对的环境完全不同。由于种种限制，农民工很难在城市获得正规部门和社会服务行业的岗位，进入社会保障体系也有诸多限制，所以农民工的工作相当不稳定，而他们被解雇之后也没有社会保障（Meng，2000；Meng 和 Manning，2010）。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农民工的流动性要远远高于一般人群，甚至是高于平均年轻的人群。根据农民工第一次进城工作的年份，以及到目前为止他们所工作过的城市的数量，我们就能计算出农民工在一个城市的平均时间。在 2008 年我们抽样调查的 5007 户农民工家庭中，因为工作关系而待在一个城市的平均年数为 3 年（图 1）。如此看来，在不受经济衰退影响的情况下，农民工平均每年的迁移率大约是 33%。基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预计，在不受经济衰退影响的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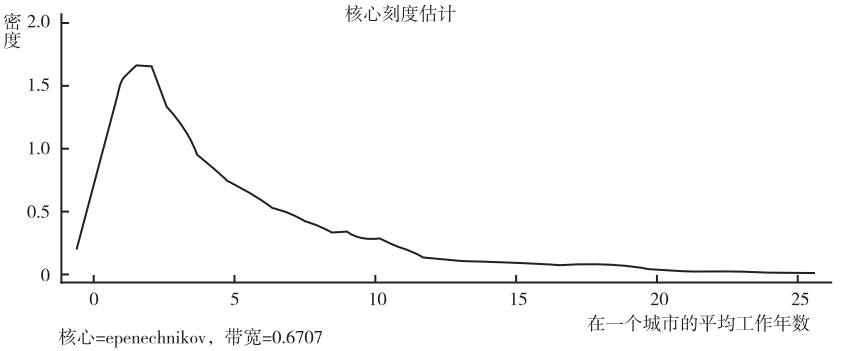


图 1　核心密度估计

常情况下，在第一次抽样调查结束到第二次调查开始之前，受访者正常的流失率大约为30%。

如前所述，在2008年10月、2008年12月和2009年2月，我们对抽样的5007户农民工家庭分别进行了3次跟踪调查。每次调查的目标人群都是来自最初的5007户农民工家庭。关于每次跟踪的受访者的流失率，我们都进行了记录（表4）。在2008年10月进行第一次跟踪调查时，受访者流失率为34.2%——已经超过了我们预期的正常经济环境下的流失率。在两个月后进行的第二次跟踪调查中，相对于最初的5007户家庭来说，流失率达到39.4%，与第一次跟踪的流失率相比又增加了5.2个百分点。如果是相对于2008年10月实际完成调查的3296户农民工家庭来说，第二次跟踪的流失率为16.7%。就在我们要开始进行第二次跟踪调查之前，我们获知，相对于最初的5007户家庭来说，第三次跟踪的流失率达到48.8%（与第一次相比，又增加了14.6个百分点）。如果是相对于第二次实际完成调查的3035户农民工家庭来说，第三次跟踪的流失率为24.95。很显然，第三次跟踪的流失率要比我们预期的正常经济环境下的流失率高18.8个百分点。这可以作为估算经济衰退对农民工就业影响的上限。

表4　三次跟踪调查的受访者流失率

	第一次（2008年10月）	第二次（2008年12月）	第三次（2008年2月）
占原始样本的比例	34.17	39.38	48.77
占上一次跟踪样本的比例		16.76	24.89
占第一次跟踪样本的比例			32.55
总样本数	5007	5007	5007
上一次跟踪的总样本数		3296	3035
目前跟踪的总样本数	3296	3035	2565

我们记录了第三次跟踪调查（2009年2月）的受访者流失率在抽样城市的各个行业的分布情况（表5）。我们在进行第三次跟踪调查时统计，所有抽样城市的原始受访者都流失了30%还要多。在这些城市里，受访者流失率超过50%的有广州、东莞、南京、杭州、宁波、武汉。很显然，除了武汉，其余城市都位于出口产业密集的沿海地区，但是出口量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三的沿海城市深圳和上海却不在此列。同样有趣的是，南京和宁波的受访者流失率竟高于东莞10个百分点，而事实上，这两个城市的出口量远没有东莞高。

表 5　不同的城市和行业在 2009 年 2 月的跟踪调查中流失的农民工受访者的比例

城　市	建筑业	制造业	教育和政府组织	各种类型的机构	服务业	批发零售业	受访者流失总比例	流失受访农民工总数(人)
广　州	45.45	53.45	64.71	53.85	52.94	58.18	54.89	400
东　莞	50.00	52.63	0.00	66.67	49.02	41.94	50.17	301
深　圳	50.00	43.66	25.00	34.88	36.25	29.17	36.75	302
郑　州	61.19	34.78	33.33	37.50	53.76	24.79	41.43	350
洛　阳	50.00	68.42	60.00	75.00	52.17	31.18	44.50	200
合　肥	50.91	36.36	56.52	27.27	37.80	29.36	38.04	350
蚌　埠	57.89	60.00	42.86	0.00	42.50	42.42	45.73	200
重　庆	46.34	32.00	71.43	38.89	42.26	34.96	40.00	400
上　海	55.32	63.33	17.65	55.00	53.88	38.66	49.10	503
南　京	76.47	69.33	78.57	0.00	69.06	67.35	70.00	400
无　锡	15.79	41.11	0.00	0.00	31.75	45.00	34.67	200
杭　州	71.79	50.48	35.29	37.50	49.67	44.74	50.25	400
宁　波	69.35	68.00	0.00	60.00	62.67	48.28	62.00	200
武　汉	65.79	60.68	38.89	50.00	52.48	52.50	55.53	400
成　都	59.26	60.00	27.78	56.25	53.97	39.64	49.75	401
总　计	59.23	53.33	38.74	42.93	50.76	39.87	48.75	5007

六大行业中的建筑业、制造业及服务业的原始受访者流失了约一半以上。因为制造业是出口密集型产业，所以直接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建筑业和服务业受到的影响可能相对轻微。所有抽样城市的受访者流失率都很高，而且非贸易部门（建筑业和服务业）也同样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农民工就业的不利形势，不能简单地归罪于全球金融危机，它是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和外部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　谁是经济衰退的受害者

另外一个我们需要了解的有趣的问题是在这些农民工里，经济衰退对谁造成的不利影响最为严重。在这一节，我们会结合 2008 年的调查数据及跟踪记录，来探讨这个问题。

在 2008 年的调查数据里，我们收集了大量关于农民工个人及其家庭的资料。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能够确定受访农民工个人及其家庭所具有的特

征。而这些特征在每一次的调查记录中是找不到的。“一个家庭能否配合完成三次跟踪调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设计了一个线性概率模型。其中，自由变量包括家庭及其户主的特征，如家庭的规模，户主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所受的教育程度、第一次外出务工的时间、曾经工作过的城市的数量、在2008年工作状况的描述（户主所在工厂的规模，工厂是否属于制造行业或是建筑行业，以及户主是否属于个体经营）。这个模型还有一个主观变量——如果政策允许，受访家庭是否愿意永远留在城市。此外，我们还设计了一组城市虚拟变量。此模型报表如下（表6）。

表6　每一次的跟踪调查中被跟踪概率的回归结果

	2008年10月的跟踪调查	2008年12月的跟踪调查	2009年2月的跟踪调查
年龄	0.019 (0.005)[c]	0.020 (0.005)[c]	0.015 (0.005)[c]
年龄^2/100	-0.024 (0.006)[c]	-0.026 (0.006)[c]	-0.022 (0.007)[c]
虚拟男性	0.022 (0.015)	0.011 (0.015)	0.038 (0.016)[b]
虚拟已婚者	0.047 (0.022)[b]	0.037 (0.022)[a]	0.036 (0.023)
家庭成员数目	0.019 (0.009)[b]	0.029 (0.009)[c]	0.048 (0.009)[c]
受教育年数	0.012 (0.003)[c]	0.016 (0.003)[c]	0.015 (0.003)[c]
第一次进城务工的年份	0.003 (0.001)[b]	0.005 (0.001)[c]	0.007 (0.001)[c]
从第一次进城务工到现在工作过的城市数目	-0.009 (0.003)[c]	-0.007 (0.003)[b]	-0.008 (0.003)[b]
如果允许,是否会在城市定居	0.038 (0.014)[c]	0.032 (0.014)[b]	0.035 (0.014)[b]
在制造业工作	-0.063 (0.020)[c]	-0.057 (0.020)[c]	-0.065 (0.021)[c]
在建筑业工作	-0.103 (0.025)[c]	-0.096 (0.026)[c]	-0.145 (0.026)[c]
个体经营	0.058 (0.041)	0.031 (0.041)	0.014 (0.042)

续表 6

	2008 年 10 月的跟踪调查	2008 年 12 月的跟踪调查	2009 年 2 月的跟踪调查
东莞	-0.111 (0.036)[c]	0.061 (0.037)[a]	0.048 (0.038)
深圳	0.064 (0.036)[a]	0.260 (0.037)[c]	0.210 (0.037)[c]
郑州	0.230 (0.035)[c]	0.275 (0.036)[c]	0.131 (0.037)[c]
洛阳	0.108 (0.041)[c]	0.185 (0.042)[c]	0.102 (0.043)[b]
合肥	0.103 (0.035)[c]	0.301 (0.036)[c]	0.150 (0.037)[c]
蚌埠	0.186 (0.042)[c]	0.272 (0.042)[c]	0.048 (0.043)
重庆	0.212 (0.033)[c]	0.234 (0.034)[c]	0.128 (0.035)[c]
上海	0.097 (0.032)[c]	0.213 (0.032)[c]	0.036 (0.033)
南京	0.095 (0.033)[c]	0.158 (0.034)[c]	-0.136 (0.035)[c]
无锡	0.062 (0.041)	0.239 (0.042)[c]	0.220 (0.043)[c]
杭州	0.085 (0.033)[b]	0.147 (0.034)[c]	0.048 (0.035)
宁波	0.118 (0.041)[c]	0.021 (0.042)	-0.039 (0.043)
武汉	0.036 (0.034)	0.114 (0.034)[c]	-0.027 (0.035)
成都	0.157 (0.034)[c]	0.285 (0.034)[c]	0.038 (0.035)
公司规模	Yes	Yes	Yes
观察值	4897	4897	4897
R 的平方	0.07	0.09	0.09

a. 10% 有意义；b. 5% 有意义；c. 1% 有意义。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我们发现三次跟踪调查获得的不同数据大致符合整个方程式。总体看来，受访者的年龄对被跟踪调查的概率有积极的影响。年龄在35岁到40岁达到了峰值，而年龄超过55岁的受访者与16岁的受访者一样，被跟踪的概率都有所降低（附录1）。而且男性、已婚，以及有其他家庭成员与之生活在同一城市的农民工，配合完成跟踪调查的可能性更大。此外，那些学历较高，在外务工时间较长的农民工更有可能被跟踪。相比而言，那些经常更换工作地点的农民工，和那些即使政策允许也不打算永远留在城市的农民工被跟踪的概率则很低。这些结果非常直观。如果我们认为，流失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衰退对农民工就业造成的不利影响，那么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即上述结论说明：单身，不具备最佳工作年龄，学历较低，以及在外务工时间较短的农民工更容易受到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这些结论与大多数国家关于失业的文献记载基本相符（Devine 和 Kiefer，1991；Svejnar，1999）。

2008年，似乎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工作的农民工较在第三产业工作的农民工更容易失去工作。但实际上，建筑业的失业情况远比制造业严重得多。从2009年2月开始，在建筑业工作的农民工的失业率增加了15%，相比之下，在制造业工作的农民工的失业率仅仅增加了7%。个体经营和公司规模都没有对失业造成影响。

基于上述所有的变量条件，除了2008年10月在东莞进行的跟踪调查以外，几乎所有城市的受访者被跟踪的概率都比广州要高。然而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跟踪调查中，东莞的受访者被跟踪的概率有所提高，可是南京受访者被跟踪的概率却急剧下跌至与广州相当。

五　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利用RUMiCI项目组提供的一组数据，来研究经济衰退对农民工就业造成的影响。平均而言，我们发现经济衰退对13%～19%的农民工的就业造成了不利影响，该数据略高于由农民工输出地区推算的10%～15%。

我们还发现，那些通常在任何经济环境下都容易受到就业影响的农民工，一般学历都比较低，且未婚，不具备最佳工作年龄，而且外出务工的经验较少。他们最容易受到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

根据我们分析，失业状况并不局限于出口产业集中的沿海地区。我们抽样调查的城市，多数都存在严重的失业情况。事实上，出口量排名位居榜首

的两个城市——深圳和上海——比其他城市的失业状况要轻微得多。

我们还发现，失业现象不只局限于出口制造业。实际上，非贸易商品领域，像建筑业和批发零售业，同样存在很严重的失业现象。

我们通过诠释这次失业现象的一般本质，证明了中国的失业状况主要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出口市场的疲软。尤其是过去几年实行的紧缩货币政策，对引发当前的经济衰退负有很大的责任。不过，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也有责任。当然，随着经济对全球金融危机作出调整，这种失业模式可能会发生变化，至少是相对而言，出口部门的失业情况可能会变得更为严重。

参考文献

Batson, A. 2008, 'China aids home buyers to curb impact of slump', *Wall Street Journal*, 24 October 2008.

Cooney, S., Biddulph, S., Kungang, L. and Zhu, Y. 2007, 'China's new Labour Contract Law: responding to the growing complexity of labour relations in the PRC', *UNSW Law Journal*, vol. 30, no. 3, pp. 788 – 803.

Devine, T. J. and Kiefer, N. M. 1991, *Empirical Labor Economics: The search approa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Olsen, R. J. 2005, 'The problem of respondent attrition: survey methodology is key', *Monthly Labor Review*, February 2005, pp. 63 – 70, <http://www.bls.gov/opub/mlr/2005/02/art9full.pdf> Svejnar, J. 1999, 'Labor markets in the transitional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es', in O. Ashenfelter and D. Card (eds), *Handbook for Labor Economics. Volume 3B*, Elsevier, North – Holland, pp. 1809 – 2858.

Wang, H., Appelbaum, R. P., Degiuli, F. and Lichtenstein, N. 2009, 'China's new Labour Contract Law: is China moving towards increased power for worker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0, no. 3, pp. 485 – 5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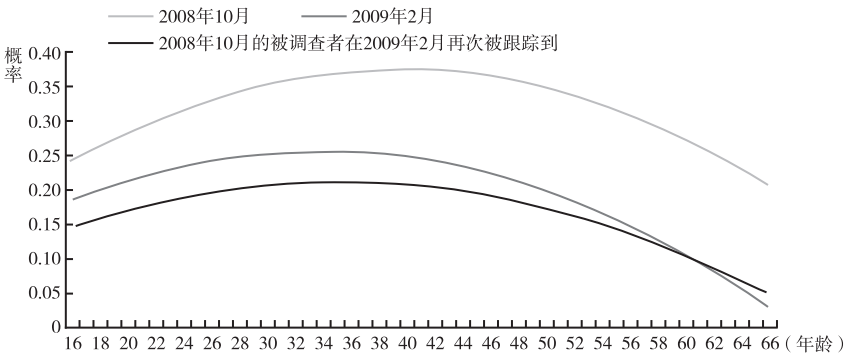
Watson, N. and Wooden, M. 2004,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the HILDSA survey wave 2 data*, HILDA Project Technical Paper Series, no. 5/04, Melbourne University, Melbourne.

Wong, E. 2008, 'Factories shut, China workers are suffering', *New York Times*, 14 November 2008.

Zhao, L. and Lim, T. S. 2008, *China's new Labour Contract Law: belated convent to better protection of workers*, EAI Background Brief, no. 378, 10 April 2008,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樊腾飞　译）

附录 1　受访者被跟踪的概率与其年龄的关系



被跟踪调查的概率和年龄的关系

附录 2　抽样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进出口值表

	当地 GDP（单位：万元，以 2005 年价格计算）	进口额（单位：万美元）	出口额（单位：万美元）	出口额（单位：万元，1 美元 = 7.8 元人民币）	进出口总额（单位：美元）	进出口总额（单位：元，1 美元 = 7.8 元人民币）	进出口总额占 GDP 总量的比例（%）	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例（%）	以出口为导向排名
深圳	57703731	10130300	13610800	106164240	23741100	185180580	3.21	1.84	1
东莞	26008962	3684467	4737640	36953592	8422107	65692434.6	2.53	1.42	2
上海	102676400	11391624	11357306	88586986.8	22748930	177441654	1.73	0.86	3
宁波	27836308	1344136	2877052	22441005.6	4221188	32925266.4	1.18	0.81	4
杭州	33625701	1268100	2622800	20457840	3890900	30349020	0.90	0.61	5
无锡	32338000	1775332	2143980	16723044	3919312	30570633.6	0.95	0.52	6
南京	27749700	1416982	1736491	13544629.8	3153473	24597089.4	0.89	0.49	7
广州	59182610	3138448	3237713	25254161.4	6376161	49734055.8	0.84	0.43	8
合肥	10449800	146922	340723	2657639.4	487645	3803631	0.36	0.25	9
武汉	25705814	423464	377750	2946450	801214	6249469.2	0.24	0.11	10
成都	24445849	281183	414116	3230104.8	695299	5423332.2	0.22	0.13	11
重庆	34425600	211821	335192	2614497.6	547013	4266701.4	0.12	0.08	12
郑州	19257908	70872	180763	1409951.4	251635	1962753	0.10	0.07	13
洛阳	12875311	25986	78075	608985	104061	811675.8	0.06	0.05	14
蚌埠	3532800	2526	24913	194321.4	27439	214024.2	0.06	0.06	15